书人茶话

郭嵩焘不是独醒者

■ 蔡 辉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氣毛，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这是严复给郭嵩焘的挽联，其中“独醒之累”几成盖棺之论。郭嵩焘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的理性、包容与见识，至今引人激赏。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何郭嵩焘能远超时代？为何连曾纪泽都对他有微词，名臣张佩纶曾弹劾他？

皇甫峥峥的这本《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堪称解惑之作，它细致梳理了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眼中的西方，这是一条从旅客、到使者、到学生、到学者、到外交官、再到战略家的渐进之路，每代人试图从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建立镜像来概括对方，只是他们都没意识到，这个镜像已大大偏离了事实。

人只能接受“自己理解的真实”，并由此得出判断。时间冲刷下，今天看当年那些判断，或无比荒唐，或惊人睿智，但它们的前提高度近似。不更新旧知识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远见。郭嵩焘亦如此，他并没完成从学者到外交官的转型。如何突破他的认知缺陷，对今天的读者亦有价值。

《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
皇甫峥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郭嵩焘

优秀者反不如“摸鱼者”

“兵家‘知己知彼’之谓何，而顾不一虑及？”1865年11月，恭亲王在请求遣使出洋的奏折中写道。理由冠冕堂皇，其实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结婚，愿带人“一览该国风土人情”，63岁的斌椿于是成为首位访欧使节。斌椿是退休官员，在亲戚恒祺帮助下，任赫德的中文教师，他希望因此能让三儿子广英进海关当差。

这是一次目的不明的“抽象出访”，四个多月逛了11国，斌椿聪明地扮演着旅客——对异国风情赞不绝口，对思想、制度等避而不谈。他坚持男尊女卑，可旅途劳累时，更愿在女士中间休息。

斌椿是“摸鱼者”，因《乘槎笔记》，被算成“进步派”。其实，斌椿赞西方各国，套用的是儒家标准，如爱和平、勤俭、重礼貌等，赞西方君主，也都是勤政爱民、礼贤下士之类。目的是同时讨好清帝与赫德，两边取利。

1867年11月，清政府任蒲安臣（美国首任驻华公使，时已卸任）为团长，率使团访美欧，蒲安臣病逝后，使团由志刚、孙家穀负责。

志刚有“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的情怀，他对西洋机器观察甚详，令西人称赞。可志刚的结论却是“本中国古法，西人得之”。

志刚奉心学，基于“心外无物”，他试图将科学、经济、道德、文化等融汇贯通，形成整体解释，找不到科技的定位，遂斥为“奇技淫巧之货”。他颇感奇怪，西方天文学发达，为何“停留”在观测阶段，不用它预测人事？

按儒家标准，志刚是优秀的，他怒斥腐败，渴望国家强大，对华侨受虐待深表同情……可基于有限的信息和落后的思维方法，他提不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志刚因《初使泰西记》中语多荒唐，被视为“保守派”。其实，志刚与斌椿同样糊涂，但斌椿只想“打酱油”，志刚想有所作为，可越认真，离时代越远。志刚证明了当时开始流行的见解：办西学应靠专业人员，而非儒家士大夫。

为何丧失了现实感

1877年，郭嵩焘访英，见德国军官以蛙跳玩耍，用前额和肘击碎核桃，惊叹：“彼土人才，可畏哉！”张德彝未记此事，却记数十种西洋游戏，如弹子球游戏规则、游泳的14要点……

张德彝不乏“聪明”，法国人质问，为何中国人称欧人为“鬼子”，他解释道，汉代中西贸易多经龟兹，音讹为“鬼子”。其实龟兹读如“秋词”，张德彝是刻意误读。在日记中，张德彝将“鬼子”写成“桂子”，既有善意，也是自愚训练，似乎“鬼子”能因此变成好词。

张德彝出身低微，八次出国，在海外度过27年，留下约200万字记录，可当时出使只是“差”而非“缺”，无向上发展空间，他无法成为外交家。

张德彝很少谈器物外的西方，谈则必称“中国孔圣之道，闻于海外，鲜有驳其非者”“天主真经之言，多与孔子之言符也”。称西方为儒家天下，急于求同，这或许是巨大落差下的心理建设，欺骗自己才能忘却事实。

郭嵩焘最早意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对近代司法、议会、教育、科技等制度均有较深入的理解，但“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今人读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仍会被他的单纯、诚恳、宽厚、高尚所打动。

然而，郭嵩焘还有另一面，他认为西人只是通商求利，“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一味退让。中法战争前，他反对援越抗法；左宗棠收复新疆前，他主张承认阿古柏；对不平等条约，也认为“以通商应之”……张佩纶指责说：“其人太暗纯，易于受绐（欺骗）。”

郭嵩焘看到了现实差距，却向古代找方案，他戴着三代之治、文野之辨的“有色眼镜”看近世变局，将西方附会为尧舜之世，忽视了列强的野心，幼稚地以为变中为西、化野蛮为文明即可突破困局。郭嵩焘并没走出儒家士大夫“有道德勇气，缺乏知识勇气”“以情怀代替解决方案”的门限，用丧失现实感换取“人格甚高”，并非真正的外交家。

知之甚多，却重回愚昧

曾纪泽自学成才，于西学无所不读。他继承了郭嵩焘“处置洋务，以理求胜”的原则，但更重实务。一方面，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主张逐步废约；另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主张“备战求和”，在中俄伊犁谈判、中法战争谈判中取得较好成绩。在外交机构正规化建设上，曾纪泽也作出巨大贡献，堪称真正的外交家。

曾纪泽还是“醒狮论”的最早推行者，离任驻英公使时，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实为英人马格里据他的想法写成），称“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被西方媒体讽刺为“在该文中所表现的浮夸精神，势将使法国感到不快，也极少事实上的依据”。它可能是吓阻法国的公关文，未必是曾纪泽的真实想法。

但曾纪泽确有狭隘的一面。郭嵩焘爱才心切，不顾年龄、地位差距，极力回护严复，对其“气性太涉狂易”，善意规劝“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曾纪泽则刻意打压、羞辱严复，名为帮其“改掉坏毛病”，实则夹杂着个人成见。严复称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

作为技术官僚，曾纪泽是聪明的，但放弃价值观的聪明，岂能持久？薛福成便直指其“过于聪明之失”。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他意识到，清朝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政府“对一套极狭隘和短视的道德问题的关注”，抓住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肯綮。见识如此高明，却离奇地转向“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薛福成从《吕氏春秋》《淮南子》中证明中国古人懂化学、电学，从《管子》中发现中国古人已有现代职业观，从《庄子·逍遥游》中看出中国古人会用热气球……美国被比为虞夏，俄国是商周，英德是汉代，意荷西是唐宋，法国是明朝。

当时“中体西用”已走入死胡同，薛福成试图用“西学中源”替代，摸索一条易行之路，却回到了志刚式的蒙昧中。事实证明：不改变认知框架，停滞在“会通”“比附”的层面，无定义意识，知之甚多，亦只会一次次回归愚昧。

警惕“后见之盲”

学者萧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中曾写道：“导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的种种挫折、失误与由此造成的不幸的，绝不是地理屏障，而是由凝固了的传统观念筑成的屏障。这甚至是比浩茫无际的大海更严峻的屏障。因为它曾有效地使无数精英人物把拒绝采撷其他文化中盛开的芬芳的人类智慧之花，视为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意义的所在。”

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在民族危亡之际，饱含爱国情怀，殚精竭虑，试图寻找一条自强之路，他们的忠诚、才华、奋斗精神无可质疑，结果却无一例外，均壮志难酬。

在相当长时期，人们将这段历史简单地解读成“保守派”与“进步派”二分，因“保守派”太强大，吞噬了“进步派”的努力，导致近代的挫折。其实，“保守派”与“进步派”是后人贴上的标签，时人无此分野。“保守派”与“进步派”共享的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两派之间的冲突多源于性格、气质、党附引发的个人恩怨，并非立场差异。

在制造“保守派”“进步派”的过程中，常以今视古——说两句貌似“开明”的话，便算成“进步派”，而说两句“迂腐”的话，便算成“保守派”。但当时背景下的“开明话”，含义与今不同，理路差异更大。

郭嵩焘疾呼：“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确有见识，可他与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那些人无本质区别。双方思维在同一水平线上，只是在“应对时变”的方法上有异，故始终无法说服对方。由此决定了郭嵩焘的生命悲剧。

相对于传统世界，近代世界是一次革命性的跃迁，开放心态、汲取知识之外，还需思想方法、思维能力的革命，这是郭嵩焘们没有完成的一步，他们努力理解西方，可理解来理解去，还是中国。

读史有“后见之明”，亦有“后见之盲”，前人看不到今人信息，今人也常看不到前人信息，从而忽略了他们判断的思想基础、信息条件、问题意识等，陷落在“冲击—回应”的简单解释中。错解前人，必错解将来，历史将失去昭示未来的功能。《远西旅人》摘去滤镜、还原真史的努力，尤显难能可贵。

好书过眼

《黄帝内经》的当代新释

■ 熊益亮

读完刘鹏教授新作《〈黄帝内经〉通识》，最大的感受就是“好读”。

全书内容的设计层层递进。先从关于《黄帝内经》“封神”的祛魅，到其成书的考证，论述《黄帝内经》怎样一步一步被构建成为中医学之经典；再从《黄帝内经》知识的述要，分宇宙、生命、疾病、养生四大主题，精选核心问题论述《黄帝内经》的精髓内容，展现中医学知识的构建；最后从《黄帝内经》后世的传承与发展，梳理《黄帝内经》知识的层层分化，成为专业与大众学习中医知识的津梁，并从传统知识“现代化”的视角总结反思出“重新阅读传统”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刘鹏对于全书的设计花费了不少心思，从而让人有一口气想读完全书的急迫，我想这也正体现了中华书局策划“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的初衷吧。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被历代中医人奉为医学之圭臬，更成为中医之于大众的象征性“符号”，因此对于《黄帝内经》的推崇，存在着一种“封神”之说。

刘鹏基于学术严谨的初衷，更出于对中医发展的忧虑，从“《黄帝内经》是黄帝所著吗？”“何谓‘内经’”“今天所见的《黄帝内经》是《汉志》所著录的那本吗”三个问题进行细致思索，小心求证，从而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黄帝内经》的价值，“神化”只会让中医蒙上一层魅色，并不利于“经典”和“传统”的发展。

在讨论《黄帝内经》的成书上，他并没有因循旧说，而是以自己擅长的文献考证和学术史梳理的方法，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作为证据，为读者分析了《黄帝内经》的成书之路。本节的论述中不乏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对于“谁是宗师”的考证，提出“方技之宗为扁鹊，而非《黄帝内经》”，对于扁鹊医学的研究很具有启发性。又如对于“君臣问答和学说异源”的论说，得出《黄帝内经》知识集合的纷繁，并自有渊源，均足以展现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受儒家“经学”形成的影响，中国传统各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各自所尊奉的典籍称为“经”，《黄帝内经》也就成为中医学的经典，其所呈现的中医药理论知识成为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渊薮。

医学是以“生命”作为研究对象之学，中医对“生命”的关注，不仅是身体层面，还关注生命与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的和谐。因此，刘鹏从宇宙、生命、疾病、养生四个方面介绍了《黄帝内经》的主体内容。

在传统天人相应、天人同构、天人合一的认识下，宇宙与人体是可以合一的，即所谓“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其中必然存在为了配而凑的牵强错误，但正如书中所说，要“抱有理解之同情”来看待古人构建这种天人密切关系的目的。

从医疗实践来看，人的生命健康与宇宙自然肯定是相关联的，所以刘鹏就其临床经验来说，五行系统与生命本身密切相关，以“脏—腑—形体官窍—情志”为主体的对应关系，对养生与临床诊治行之有效。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医对于生命认识有不少让今人困惑或者说难以理解的地方。刘鹏从五个问题出发，为大家揭秘中医的解剖、命门、肺朝百脉、肾主水和经络，不仅为读者解开了诸多迷惑，也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医问题的探究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去学习中医知识。

《〈黄帝内经〉通识》
刘鹏 著
中华书局
2024年出版

中医对于疾病的分析和养生的追求，极具特色，而且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非常成熟。

对于疾病的认识，要从病因出发，抓住病机，诊断出病证，再对证施治，《黄帝内经》中已有“九针”（针刺）、“十三方”（汤药）、“祝由”等具体治疗的记载。

对于养生的认识，已经明确提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由高到低的养生境界，“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总原则，以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养神”的具体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各家均围绕着各自的经典不断诠释与解读，《黄帝内经》的发展亦是如此。

从《黄帝内经》的文本传承出发，刘鹏梳理了《素问》与《灵枢》的版本与流传及其历代医家的注释，尤其是清代经学家从考据视角推求本义的校诂与近代医家在西学参照下的注解，对于传统中医的现代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黄帝内经》的影响来看，它保存了中国早期医学文献，奠定中医理论基础，成为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的源泉，不仅是业医者的必读书目，也走进了市井百姓家，从《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小说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同时，《黄帝内经》传播海外，尤其对于汉字文化圈的医学具有重要影响。

学习现代中医，我们依然无法离开《黄帝内经》，因为它是中医之本，但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则是时代的课题。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如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论述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用物质功能之分来诠释中医体用之辨，用西化的身体来对应传统的脏腑等等，但依然没有解决传统知识现代性的问题。所以，刘鹏在《〈黄帝内经〉通识》一书最后提出：“重新阅读《黄帝内经》，也许正是为了寻找迷失的‘传统’。”

三味书屋

吴哥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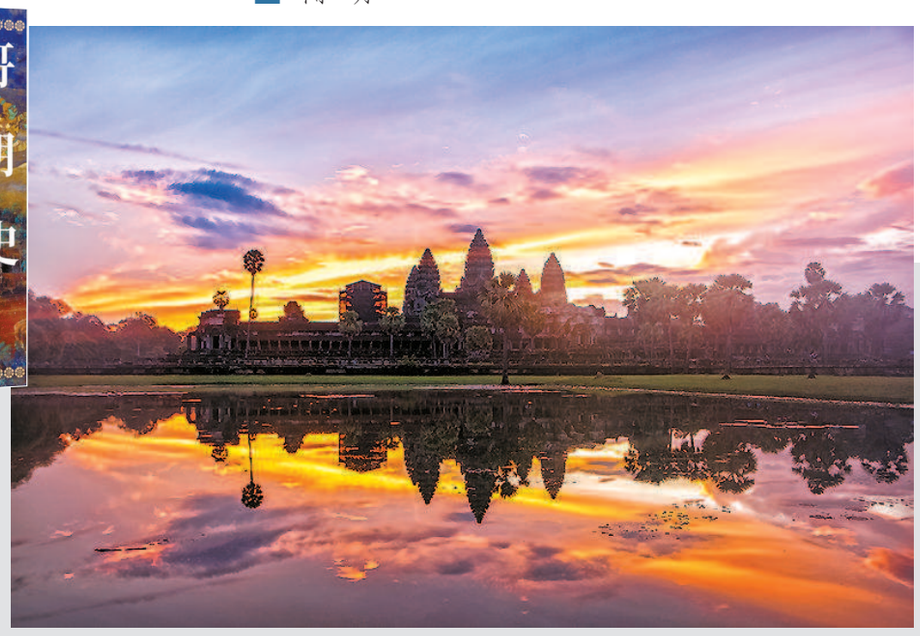
■ 闻 明

2001年3月至6月，日本上智大学的吴哥遗迹国际调查团与柬埔寨国立艺术大学考古系、艺术系的同学们一起，在斑黛喀蒂寺遗迹中偶然发现并发掘出274座被埋在寺内的佛像。这些佛像制作于10世纪至13世纪中叶，推断是因为当时信仰印度教的国王发起的废佛毁释行动而被毁坏和抛弃的。此次出土的实物为考古学家填补距今800多年前的吴哥佛教历史提供了巨大帮助，同时也为这个时代的柬埔寨人增添了一次重新建立文化自信的机会。

柬埔寨是一个曾经孕育出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遗憾的是因为战乱，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旧都城，绝大多数人迁移至别的地方生活，历史由此被掩盖在密林之中。无数宏伟的石雕建筑在藤蔓间静静沉睡，等待着无意闯入的发现者，向他们诉说那些惊心动魄的秘密。碑文漫漶不清，造像历经沧桑，王朝不断易主，时间依旧轮回。大地仿佛陷入了永恒的凝固。

这里的往事好似一团迷雾，人们无法寻找到那些迷人的历史角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书写文字的贝叶不能长久保存。作为一种棕榈科植物的叶子，无论怎样精心呵护，百年之后都会风化干燥，变成粉末。元成宗元贞年间，来自中国的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使团来到此地，逗留约一年后回到中国，以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一册《真腊风土记》。这本书如今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全世界研究吴哥历史的考古学家所倚仗的重要文献。历史线索不单单隐藏在石壁之上，更在文化中口口相传。

对于《吴哥王朝兴亡史》的作者石泽良昭来说，原始碑文与中国文献是他研究吴哥历史的两件法宝。自从1860年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调查吴哥窟，开始向世界郑重介绍这处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遗址，“吴哥学”一下子风靡了世界。但石泽教授知道吴哥窟并非一日建成，对它的研究也绝不能是莽撞的跟风。他以毕生热情奉献于吴哥的文物研究当中，历经40余年，亲自赴柬埔寨30多次，与时间赛跑，只为用尚为完好的原始记录，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吴哥王朝。



《吴哥王朝兴亡史》
[日]石泽良昭 著
瞿 亮 译
译林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吴哥窟（图源：视觉中国）

吴哥王朝自公元9世纪开始，至14世纪结束，其间历经600余年，有着26位被正式记载的国王。“吴哥”一词的发音来自梵语的高棉语化，由此可见吴哥文化受印度教影响颇深，并且持续时间很长，这在随处可见的石刻壁画题材上有着充分体现。吴哥王朝最初的小都城建于荔枝山的密林里，那也是他们走向远方的起点。第一代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为自己的统治行为赋予神格，所以他自称是“守护精灵的王中之王”。在为他举行“转轮圣王”的特别祭祀仪式之后，他也就获得了“超人性的人格”。

吴哥能够成为强大王朝并非侥幸，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石泽曾经惊讶地发现，生活在此处的柬埔寨人体内已经进化出了可以免疫疟疾的血红蛋白，这让他们能够与病毒共存而不至于危及生命。凶猛的暹粒河水冲击形成的广阔扇形平原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沛，非常适合于种植稻谷。周围的荔枝山被官方视为神话中的须弥山，与暹粒河一道组成了可供无穷渲染的神话。这里即是仙境，国王就是神仙降临于人间的替身。

公元802年，阇耶跋摩二世继位。他也被后人称为吴哥王朝真正的奠基者。阇耶跋摩二世从770年开始首先讨伐因陀罗补罗国，然后北上征讨三波补罗王国，最后于790年逐步平定吴哥及周边地区，把国家政治中心从湄公河下游转移至吴哥（国家也从此与“吴哥”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阇耶跋摩二世是第一个确立“转轮圣王”与“神即是王”意识形态相互叠加的国王，这种意识形态为后代诸王所继承，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大一统的王朝由此开始全新征程，而国王本人也在无意中为后来者演示了另一种登上王位的方式——血统并非主要，实力居于首位。王位传续不一定只有国王的儿子或兄弟才有资格担当。阇耶跋摩二世继位之前吴哥实际处于分裂状态，先凭实力对诸人行使讨伐，至于血统问题不妨等到统一之后再说。

阇耶跋摩二世去世之后，由儿子阇耶跋摩三世继位。43年后阇耶跋摩三世离世，继任者因陀罗跋摩一世竟然是阇耶跋摩三世的外祖父，可见家族势力的多寡永远是争取政治地位的首要因素，不因社会环境和平或战乱而有所不同。因陀罗跋摩一世在任期间兴修水利，修建了对于农业经济非常重要的巴莱（贮水池），使一年两作水稻种植成为可能，打下了王朝繁荣、人口增长的基础。他还为后世提供了模范示例，要证明国王与神明的绝对联系，需要修建“三建筑”加以佐证。“三建筑”包括大都城、大王宫、大寺院，这既是印度教思想的建筑化体现，也是国家逐渐富强的象征。

从苏利耶跋摩一世开始，大兴土木蔚然成风。他主持修建的大圣剑寺面积比现存的吴哥窟遗址大4.7倍，气势磅礴。在东巴莱之外又建造了西巴莱（贮水池），总面积达到16平方公里。而后继位的乌达雅地耶跋摩二世建设了巴方寺，把自己平叛的丰功伟绩雕刻于寺院石碑上流传后世。这座华丽而又豪华的大型寺庙为周达观所见证，他曾于1296年造访，发出了“有铜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郁然”的感叹。

最著名的建筑群当然属于苏利耶跋摩二世在巴肯山东侧耗费30年所建造的吴哥窟与新王宫。《吴哥王朝兴亡史》书中用了“规模宏大，雕刻精美，整体设计”12个字来评价，相信每个见到吴哥窟的人都会由衷赞叹这里的无与伦比。它采用左右对称设计，据估算所用石材远远超过了10万块，石料重量达到200万吨以上。建筑手法由中间往两侧堆积，石材之间不使用任何黏合剂，仅仅用砂砾、水与盐的混合物填充，两块相邻的石材间经由近50次相互摩擦，于表面形成张力，实现紧密黏合。同时在高墙拐角处使用60至80厘米的“铁榫”铆定石块，隐蔽又美观，尽显建筑师的高超智慧。

这里原是暹粒河的旧河床，在掘平地面的基础上，每铺设10厘米厚的河砂便浇水加固，并用20厘米大小的碎石块填充在重要部位，使地基坚固持久且能承受更大的强度。吴哥窟整体分为三层，从地面到最上面的中央祠堂，高度落差达到65米。整个建筑群的基础部分就已经有四万平方米以上，每层均建有充满精美雕刻的回廊与藏经楼，第三层的坛基高11米，正中位置的中央祠堂巍然屹立，如坐云端，如登仙境。

吴哥窟建筑群代表了当时吴哥王朝的最高建筑典范，它不但体现在辽阔广博的建筑面积、宏伟壮丽的建筑风格，以及不惜耗费30年精益求精的建筑精神上，更是对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积极宣扬、对国家文化的全面总结，甚至还有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这种情感充斥于每一处回廊的角落里，回响在每一幅雕刻中。

在苏利耶跋摩二世统治时期，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国王开始有意识地恢复与中国北宋王朝的交往，同时实施有步骤的领土扩张，与周边的占婆国时常兵戈相向，以获取更多战争利益。这一时期国内的民族自豪感与意识形态宣传也达到极盛，在吴哥窟的第一回廊墙面上刻有著名印度教长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战争场面描绘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历史回廊”中刻绘了国王的真人像，各位大臣与军队只待一声王命便可踏上征途。“天国与地狱”回廊更加直接，阎魔王的最后审判如期而至，为国家牺牲的将士可奔赴极乐净土，而诉诸恶行的人只能堕入地狱。

高棉与占婆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近300年，无数高棉勇士战死沙场。可以说吴哥王朝成也战争，败也战争，1118年国力强盛之时，吴哥军队在洞里萨湖上大败占婆军队，甚至杀死了当时的占婆国王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而200余年后的1351年，近邻泰国的国王拉玛铁菩提二世进攻吴哥城，几度交锋之下，吴哥都城彻底沦陷，战旗陨落，600年繁荣的吴哥王朝由此终结。